

東南紀事

社光國勸神

主編者

王李程演
獨清季生

編輯者 中國歷史研究社

本書輯錄 王獨清

出版者 神州國光社

發行者

神州國光社
上海福州路
三八四弄四號

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出版
民國三十六年四月三版

實價

序 言

校點完了這一冊叢書，本來想對於明末底歷史做些系統的分析，但恐怕一寫便要寫得太長，所以只好寫幾條所謂感想。

這兒所收集的幾種史料裏面有三種便是記江陰守城的一段歷史的：『江陰城守紀』、『江陰守城紀』、『江上遺聞』。這一段歷史是明末民族鬥爭中最放異彩的一頁，那種悲壯的活劇不消說在任何方面都值得我們禮讚。不過，我們卻是應該在這兒提出一個問題來的，就是爲甚麼江陰會有這一段守城的歷史？在當時南京鎮江都相繼降服，爲甚麼江陰卻會不顧一切，竟能孤城死守，完成了那樣光榮的犧牲？

這問題要回答卻也簡單一句話：因爲民衆起來救亡的緣故。我們一向談起江陰守城的故事時，總說是閻典史（應元）底功勞，這自然是不錯的，不過，實際上這個活劇中主要的力量卻完全是下層的民衆。關於這層，這兒底三種史料都有同樣的記載，我們可以看出當時實在是民衆在那兒做着主人的。從『四鄉居民不約而至者數十萬，合城罷市』、『江

『陰城守紀』一直到最後殊死的巷戰，沒有一處不是民衆底足跡。這史實給我們留下的不能泯滅的教訓是再明顯也沒有的了。

這一段歷史中代表的人物自然是閻典史和陳典史（明遇）以及諸生許用。典史可以說是一種起碼的官職，然而當時的領導者卻偏偏落在這樣的人物底身上。這是一點也不足奇怪的。本來在一種犧牲的鬥爭中，愈是下層的人物纔更能成爲鬥爭中的戰士。這法則就恰恰支配了當時歷史上的腳色。閻應元答復劉良佐的一句最妙的話道：『有降將軍，無降典史。』這真是很透徹地說明了這個真理。

最使人嚮往的要算許用這個人物。他不但是江陰守城的首倡者，而且也是鼓動民衆的一位革命家。他對於清廷『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的命令答復的話是：『頭可斷，髮決不可薙！』這簡直可以說是一個鼓動民衆的口號，無疑地這句話在當時是起着絕大的作用的。同時他還是一個詩人，他給當時的從事民族鬥爭的民衆做了一些可以唱的大衆歌曲，在『江陰城守紀』上便給我們留下了一首，那便是：

『宜興人一把鎗，

無錫人團團一股香，

靖江人連忙跪在沙灘上，

常州人獻了女兒又獻娘，

江陰人打仗八十餘日寧死不投降！」

這歌算是一直流傳到現在，已經成了江浙一帶底民歌了。只可惜的是另外的一些歌曲都已失傳，而許用底身世更無從攷查，這卻實在不能不算是一個憾事。

在明末一代中，屠殺幾乎成了歷史上中心的事件。施行屠殺的不消說是不外兩種勢力：第一是內亂的農民隊伍，即是所謂流寇；第二便是外禍的清兵。關於這層，李季先生在本叢書第十七冊底序文中講的最對：『屠殺的根本原因是應該在階級對抗中去找。』清兵入關，已經處於征服階級的地位，對於被征服階級的明朝底遺民自然要出之以屠殺的手段。而農民隊伍尤其是由於階級的仇恨而興起的勢力，對於一向以重賦苛政壓迫他們的階級出之以屠殺更是必然的事。不過，當時在這兩種勢力擾害之下的那般明末底士大夫，卻都是寧可使明室亡於清兵而不肯使明室亡於革命的農民隊伍的。請清兵入關的吳三桂固然不用說，就是抗拒清兵的那些歷史上著名的人物也不會兩樣。就因為這層原因，所以當時便有了許多不降『賊』而守城的故事，同時那些故事也便特別地裝上了悲慘的

場面。在這兒所收的『榆林城守紀略』中描寫李昌齡等被擒後對李自成的態度是很有意思的：

『……自成曰：「吾虛上將以屈四將軍，奈何固執不相與共富貴！」昌齡等罵曰：「驛卒敢大言！吾輩朝廷大將，草竊不久且滅！」……自成笑前解四人縛。世威叱曰：「勿前污將軍衣！」……』

這倒不是簡單的『罵』而是一點不含糊地在吐出了當時士大夫對李自成的一般的意見。『朝廷大將』遇到『驛卒』反叛，怎麼能不出死力去抵抗呢？所以李昌齡等臨死時後悔他們不曾認真地把河套底蒙古兵請來『早滅此賊』，這還不是和吳三桂請清兵一樣的心理嗎？

因為這樣，關於明末底兩種屠殺——農民隊伍底屠殺和清兵底屠殺——的史料，我們卻就不能不都來打一點折扣。就是說：凡關於記載前一種屠殺的，一定有過分誇大的成分；而關於記載後一種屠殺的，卻一定有不充分的地方。我們應該相信：李自成是被塗成了花臉的，清兵卻大半是被穿上了禮服的。

說到士大夫借外禍去消滅內亂，這兒所收的『揚州城守紀略』中也有一個例證。左

良玉舉兵聲討馬士英，破了九江，安慶，馬士英便和阮大鋮計議着說：『左兵來，寧北兵來，與死於左，不如死於北。』——這已經成了兩句名語，算是赤裸裸地說出了士大夫對於反對派的態度。這兩句名語底實踐，便是『緩北而急左』，『使邊備空虛』，讓清兵成了『直入無留行』的形勢。左良玉本人固然是當時典型的所謂『剿匪』的武人，但是據他參馬士英八罪的奏疏以及聲討馬士英的檄文（俱見『明季南略』『明季遺聞』『南明野史』等）看來，他確是代表着當時一部分反馬的上層份子底心理的，怪不得馬士英要那樣出死力去對付他。我們只要把流傳下來的馬士英所說的許多『警句』（如『明史』所記：『北兵至猶可議，款左逆至則若輩高官，我君臣獨死耳。』『南明野史』所記：『寧可君臣皆死於清，不可死於左良玉手。』）稍加一番玩味時，我們一定會明白那些話所表現的卻正是從古以來內亂時統治者底傳統精神。

關於明末一代在動亂中出動的那些作爲大臣領袖的上層人物雖然是複雜得很，但卻大致可分爲三類的：第一是士大夫底正統派，史可法，姜日廣，黃道周等都屬於這一類。他們可以說都是封建道德的典型代表者，而對於處理當前的事變卻實在都是些迂腐的人物。像這兒所收的『揚州變略』中所記的史可法底無能，以及『江變紀略』中所記的義

日廣底無用，都可以使我們瞭然。再如黃道周『東南事變』中記唐王曾稱之爲『商彝周鼎』，其實也只是這樣一個古董；我們只要看他在崇禎時所上的那種空言的奏疏以及後來受制於鄭芝龍的可憐的下場，便可以知道他底爲人。不過這一類的人物卻都是以死節作為他們最後的目的的，不待說他們是給明季亡國史上留下了發揚『忠義』的光輝。第二是左派的實力派，這一類的代表人物當以鄭成功爲最傑出。鄭成功和江浙諸領袖不能融洽，恐怕就是因爲所代表的傾向不相同的緣故。張煌言曾說鄭成功是『彼意似不欲本朝復興』，這多少算是看出了一點他底企圖。當時諸王底腐化懦弱，鄭成功大概是早已看穿了，他是覺得須要以自己爲中心，另創一個新的局面纔行。像他那樣能夠打破舊的道德觀念，打出『殺父救國』的旗號（這層在『東南紀事』底鄭成功傳中竟沒有載出）的人，不成問題是和那般拘守成法的士大夫難得一致的。第三便是機會主義者的一類，吳三桂，馬士英，阮大鋮，便是這方面底名人。這一類的人物最多，都是直接或間接地先在提倡着『以夷制華』的政策而結果卻又是爲清廷執行着『以華制華』的政策的腳色。

爲甚麼吳三桂那般人先在爲『華』而『以夷制華』，結果卻又爲『夷』而『以華制華』呢？這倒的確是一筆糊塗賬。不過，居於統治地位的人卻總是在擺着這一筆糊塗賬，

以上總算拉雜地把一些所謂感想寫完了，現在應該來把這兒所收的幾種史料底作者略為介紹幾句。

戴名世〔南山〕這應該是大家都知道的，這兒可以不用多說。

記江陰守城的三位作者，以許重熙為最早，據『越縵堂日記』他，在崇禎時以撰『五陵注略』等書為誠意伯孔昭所糾，革職。他是江陰人，說不定他自己便參加過那一次的戰爭的。韓英，字之少，別字慕廬，長洲人，康熙間官至禮部尚書，著有『懷堂記』沈濤，字次山，江陰人，乾隆丁巳進士，曾知江西長寧縣，並纂『長寧縣志』〔見『江陰縣志』〕他大概是一個博習掌故的人。

『東南紀事』底作者邵廷采，字念魯，餘姚人，曾主餘江書院。他底『東南紀事』據說係成於康熙三十六年至三十七年，更有『西南紀事』是這書底姊妹篇，都凡十二卷。吳德旋『初月樓續聞見錄』說他寫『東南紀事』係問教於黃宗羲，寫『西南紀事』係問教於張五臯。可是他並不會看見他這兩部書底出世，算是一直到光緒十年纔由邵武徐幹刊

行，距離他著書的時間已經將近百年了。

最有趣味的是『江變紀略』底作者徐世溥（字巨源，新建人）底生平。這人據說是一個強盜，終其身以從事於焚掠的生涯。又一說：他因為和鄉里發生嫌怨而『降賊』（這所謂『賊』，不消說就是指叛亂的農民。）後為仇人所殺。他不但能文而且能詩，所著各集都是用的『榆墩』『榆溪』兩個化名。（見傅以禮『榆墩外集』跋）像這種生活的文人在中國歷史上是很少見的。只可惜得不到他底詳細的傳記。

還有幾句單關於江陰守城的三種史料的話。

『江陰城守記』『江陰守城記』『江上遺聞』這三種底字句幾乎十分之七八都完全一樣。據我看來，許重熙底一種怕是最早的藍本，不止韓菼和沈濤，其他記載這一段歷史的多半也都是從這個藍本中抄出來的（例如『明季南略』）。只是許重熙記許用作許用德，記陳明遇作陳明選（『江上遺聞』謂陳明遇名選，但也不能據此而另呼之為明選）。若按照我定這書為最早藍本的推理，似乎應該『改正』其他兩種的，但是許用和陳明遇畢竟多於許用德和陳明選（以外他書也都與韓菼和沈濤的兩種相同），所以最好

序
還是都不『改正，』等將來再說。

王獨清。
二三，
三十月，
一九三六。

目 次

總序	蔡元培	一
序言	王獨清	一
保定城守紀略	清戴名世	三
榆林城守紀略	清戴名世	二
乙酉揚州城守紀略	清戴名世	三
江陰城守紀略	清韓菼	二
江陰城守後紀	清許重熙	一
江上遺聞	清沈濤	八
江變紀略	明徐世溥	一
揚州變略	明佚名	八
淮城紀事	明佚名	三
東南紀事	清邵廷策	一
江南聞見錄	明佚名	七
東江始末	明柏起宗	三

保定城守紀略·專載

崇禎十六年，因賊禍孔棘，建牙之吏，遍於幾輔，人地互乖，權位牽掣，乃撤去總督二總督治巡撫九，總兵二。而保定舊設一總督，一巡撫，至是撤去總督，而以兵部右侍郎徐標爲巡撫。標別募兵七千，肄習戰車火器成一軍。京師凡千里，凡設總督二，巡撫九，皆治兵以擁護京師。自山海，永平，達於通州，天津；而昌平，而懷柔，而陽和，而宣府，而大通，而寧武，至山東，河南，凡十三節鎮，居京師咽喉皆指之處。卽有緩急，可呼吸惟命。然法令久弛，兵與將多不習戰，賊至輒望風潰。惟保定堅不下，死義甚烈焉。

初賊之漸逼畿輔，上倚督師李建泰，保定巡撫徐標以爲重。建泰之出也，遷延觀望，託言有疾不能軍，其左右已陰通賊。而徐標行部至真定，爲副將謝嘉福所殺，遣人出固關迎賊。是時新在保定知府何復未至，同知邵宗元署府事。而郡人張羅彥，以光祿寺少卿家居，羅彥兄弟五人，其兄進士張羅俊，弟諸生張羅善，武進士張羅輔，皆守死。而張羅喆出亡，幸以免。

初上之命建泰督師也，甫出京，而宣雲已報陷。保定總兵馬岱介夜見張羅彥曰：「賊分

兩路來，任珍自固關，劉芳亮自河間。吾當出鎮蠡縣，居衝要以待敵。請殺妻子以決死戰。城守之事，一惟公等任之。』羅彥曰：『諾。』旦日，岱果焚其妻孥十一人，率師去。羅彥兄弟與宗元及後衛指揮劉忠嗣主城守事，收召鄉兵得二千人，與郡人故鄆州知州韓東明，故平涼通判張維綱，諸生韓楓等，刑牲盟北城上。而適聞真定之變，謝嘉福以反書至，羅彥裂之而分汎設守，部署稍稍定。

監視太監方正化者，舊守保定有功，素善羅彥，因羅彥以識宗元，與知府何復先後至，復之來，爲保定也，誓必死而後入。旣入，宗元欲以印授復。復曰：『城中事先定自公，不可臨敵易主，以搖視聽。吾當同生死耳。』大會諸生，講見危授命章，聞者爲之益奮。

李建泰軍道潰，所齎帑銀以數萬，衛者僅親軍五百人，退師抵保定。守者不納。賊將劉芳亮且至，建泰使其中軍郭中傑、李勇，因金毓峒以求入。金毓峒者，爲監察御使有聲。十七年春正月，召見便殿賜宴，命監甯大軍，宣大俱奉建泰節制者也。及宣大失，復命留守保定。是時保定之屬，賊騎已充斥。毓峒入城，謂守者曰：『勉之，戮力固守，以爲京師捍衛，此睢陽之烈也。』散家貲犒士，士皆爲之感泣。至是毓峒謂羅彥宗元曰：『吾等不可使督師陷賊。』乃開城納之。』

明日，芳亮兵抵城下，呼曰：『城上人何以不降？』羅彥顧其下厲聲曰：『苟欲降者，取我首去！』劉忠嗣撫劍曰：『有不從張氏兄弟者砍之！』怒目髮上指，衆諾聲如雷。賊驚顧退五里而舍，是爲三月二十日也。

明日，賊大至環攻。會聞京師已陷，羅彥兄弟、宗元等哭曰：『曩者只城守，今則復君父仇矣。』各飲泣北向拜，又羅拜重訂盟。毓峒大出銀牌懸堞上，購賊頭。羅彥復出錢佐賞。賊乃穿城壕涸其流，伐木治攻具。

二十二日，賊大攻西北陬。守者奮殺賊無算。賊繞城詬，守者更切齒。張光祿隨射書入城，說以國亡誰與守。建泰得之，以示何復，方正化曰：『宜爲閩郡生靈計，得一用印降書，足以免。』正化泣不應。復曰：『復固未嘗受印也。卽有印，復必不爲此。』乃召宗元。宗元至而自願其肘曰：『前日何公讓印，而宗元不辭，爲城守先在宗元耳。今事急且抱印死，卽何公爭亦不與。肯以送閣下降書乎？』宗元江南一老貢生，下吏薄祿，尙不肯北面事賊。閣下以宰相專征，不圖報萬一，乃爲趣降，獨不念皇帝親祖正陽門君臣相別時乎？』建泰不能答。其從卒欲兵之，思奪其印。宗元擲印於地，拔佩刀欲自刎，左右力持之。俄而羅彥、毓峒馳至，取印納宗元懷中，曰：『亟上城禦賊！』